

有些事情， 医生永远不知道”

上海医生许琳将中美两国 80个重病患者故事写成书

每天和无数病人打交道，面对着一张张痛苦的脸，除了对症下药外，医生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

想起这个问题，在沪上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许琳自己也吓了一跳。“因为疾病，他们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剧烈变化？生活质量是否严重下降，甚至因贫穷而无法维持生计，还有些人是否已离开了人世？……有些事情，医生永远无法知道。”

毕业于全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，3年前赴美进修，许琳遇到的第一个病人，彻底改变了她。随后她花了一年多时间采访了上百名病人和专家，洋洋洒洒写就一本80个故事、257页的书。

“这之后，我整个人仿若重生。”

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

“这个小病人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。”是病人们点燃了我。做医生并不容易。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，也需要有正能量来激励我们。而这些正能量的源头，就是病人的理解。”

青年报记者第一次和许琳打交道，是采访关于艾滋病的话题，她，一个眼科医生，在美国时见到了一位有史以来活得最长的艾滋病病人。鉴于艾滋病在国内还有些敏感，为了慎重起见，心有顾虑的她三审稿件，直到晚上11点多才确认，稿件OK了。“这真是一个执着的女人。”

时隔数月，知道了她出版了一本“本半专业”的书，描写了5个疾病主题。

书的第一篇记录的是一个全盲、没有语言能力、不会走路、智力相当于8个月大的婴儿的23岁女孩米尔和她的妈妈玛丽亚的故事。当翻到最后一页时，记者眼中噙满了泪水，心生一念：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特别的医生？

在10月的一个午后，身怀六甲的许琳出现了。声音和电话里一样悦耳，虽然因为怀孕身形有些变化，但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女人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之所以当医生，是受了妈妈的影响。”在周遭嘈杂的环境中，她的声音很有穿透力；妈妈也是医生，乐于助人，哪怕是对个人卫生习惯很不好的患者，哪怕对方身份低微，也不会流露出丝毫不耐烦。妈妈曾经教我：结交朋友时，要看那人对待卑微的人

秉持什么态度。”爱心，是许琳从妈妈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第一课。

母亲的言传身教固然是“基因遗传”，但许琳透露说，自己真的受到感染还得从最早亲手治疗的病人说起。硕士毕业那一年，她在眼科不同的病区轮岗，作为住院医师，她亲自为一个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小患者换药。那位小男孩不到4岁，原本男孩的父母希望儿子的病可以自愈，但奇迹没有发生。

就这样，这个原来只需眼球摘除的诊疗发展到整个眼眶内容物都需要剔除，男孩的眼眶变成了一个黑洞。换药时，小朋友在妈妈怀里静静地坐着，痛得泪水在另一只仅存的眼内打转，他却一滴也没有掉下来。男孩两只小手的指甲死死掐着自己的手指，压得一红一白，但他自始至终没吭一声。现场除了男孩，其他人都哭了。

“这个小病人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。”虽时隔数年，但那幕场景仍历历在目。

她碰到的第二个小病人，是个名叫乐乐的3岁女孩，同样让她记忆犹新。许琳见到她时，乐乐半张脸都被扎上了绷带，被妈妈抱着在走廊里看玻璃框里的医护照片。

“这是谁呀？”乐乐妈妈指着为她动手术的老主任的照片。乐乐见状，两只小手趴在玻璃上，“啪”的一声亲在老主任的那张照片上，“这是爷爷！”此情此景让许琳心生爱怜。“虽然乐乐才那么小，这位老主任让她吃足了苦头，对她可谓是有创伤性记忆，但医生对她的好，她是心知肚明的。”

当谈到医患理解，许琳也没有忘记一些曾鼓励过她的点滴小事。有一次她加班到晚上7点半，打算乘坐电梯到楼上取打印纸。



在沪上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许琳相信：不仅仅是医生在治疗病人，病人也在疗愈医生。

一位病人家属也在等电梯。“医生，你到几楼？”我上楼。”这位病人随即摁了往上的按钮。一问之下，原来她是要到楼下。“没事，我闲着没事，你们医生太忙了，你们先请。”让许琳诧异的是，这位阿姨并非她对口的病人家属。这些不经意的举动，让许琳感到心中暖暖的。

“是病人们点燃了我，让我很感动。做医生并不容易。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，也需要有正能量来激励我们。而这些正能量的源头，就是病人的理解。”许琳说。

“一些病人到医院时，正处于人生最低谷，没钱、没健康、没希望。他们的精神已处于崩溃的临界点，很容易一触即发。”

这些年来，许琳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医生的职业经历和社会阅历往往有些脱节。年轻时常常不能理解病人的疼痛、贫穷以及现实的无奈，一般在人近中年时，才能体会到人生的苦痛。

几年前，在松江分院急诊室值班，一对60多岁的夫妻来看

病，中年男子眉毛上有一道4厘米的裂口，伤到了眉骨。在帮对方缝合伤口时，男子显得特别沉默，表情沮丧。他的爱人在门口哭得异常伤心。

许琳觉得很奇怪，面部创伤对一个20岁的女生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，但对老年男性来说并无伤大雅，有必要悲痛欲绝吗？一问之下，她才得悉，夫妻俩患有精神病的儿子走失了，两人几天未合眼，跑遍全城，在焦急寻觅儿子的过程中不幸出了车祸。

“你知道现在为何时常有医患矛盾见诸报端吗？”许琳顿了顿，正色道：“一些病人到医院时，正处于人生最低谷，没钱、没健康、没希望。他们的精神已处于崩溃的临界点，很容易一触即发。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一点点温柔的对待，他们也许立刻会觉得：人生还是有许多希望的。”

曾几何时，许琳在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做过一个试验。闭上眼睛20秒，在绿灯亮起时，独自过马路，当她真的想要前行的时候，一种难以名状的巨大恐惧袭来，让她止步于斑马线前。可在现实生活中，盲人几乎每天都要在黑暗中独自过马路。“有些事情，医生永远都不会知道。”许琳说。

“我真的了解他们吗？我真的懂这些患者吗？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？”作为一名医生，看到他们自信而自强的笑容，让你觉得他们比你更强大。”

2010年，许琳赴美国哈佛医学院深造，在临床工作时，她见到了第一位病人米尔和她的妈妈玛丽亚。在见到她们前，许琳一直很自信，认为自己医术高明。但见到她们后，她开始变得不那么自信了。“这场遇见，改变了我，就像一道闪电，激发了我写书的念头。米尔的病，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，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沉重的负担，但作为一名医生，看到她们自信而自强的笑容，让你觉得她们比你更强大。”

在闲聊中，许琳了解到米尔的弟弟在17岁那年因为同样的疾病去世。

“我真的了解他们吗？我真的懂这些患者吗？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？他们是怎么来医院的？又是怎么跨出诊室的大门的？有的病